

天主教在广西民族山区的传播历史与现状*

曾志辉

内容提要: 本文在查阅相关中外文献资料和多次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借助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晚清以来天主教在桂西民族山区、桂中大瑶山区、桂南十万大山等三个广西民族山区的传播历史与现状,并分析了其传播特点及由此形成的地处边缘而文化多元的“山区教会”特点。

关键词: 广西 天主教 民族山区

作者简介: 曾志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一、前言

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发端于明末;逮至南明永历朝耶稣会士在桂林的短暂传教;直到鸦片战争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才大规模进入广西,深入边远山区,积极向各山地民族传教。^①

隶属于教廷传信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缩写:M.E.P.或MEP)成立于1664年,它与法国政府存在一定的资助关系,是面向中国西南基层群众传教的最主要天主教组织。1848年,该会管辖的两广教区正式成立,1852年,升任两广代牧主教的李播(Libois)便立即采取措施,派遣从西藏回来的肋诺神父(Renou, Charles-René-Alexis)进入广西,了解当地的社会及宗教情况。几个月之后,他便向主教提出了一份报告。^②

二、天主教在广西三个民族山区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一)以壮族、彝族教徒为主的桂西民族山区

依据报告,巴黎外方会传教士马赖(Chapdelaine)在李播主教的指示下,于1853年12月26日从广州道经广东、湖南,辗转到达贵阳,被派往桂黔交界的兴义泥函大山教堂学习中文。1855年冬,他穿上“彝族”服装,携布依族传教员卢廷美的两族亲兄弟和女教徒曹桂英,进入广西泗城府西林县白家寨、安定、板坡、那满等民族村寨传教。1856年12月14日,他又来到西林县板坡村,新任知县张鸣凤把他抓获,经审讯后予以处决,引发震惊中外的“西林教案”,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战后清政府被迫晓谕天下:“任由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③

巴黎外方会传教士陆续从贵州兴义进入桂西民族山区传教。若神父(Gennevoise)于1867年,殷正衡神父(Bazin)于1868年,分别来西林常井村(今田林县定安镇常井村常井屯)面向当地彝族群

* 本文得到2009年度“马爱德中西文化研究奖学金”资助。感谢巴黎外方传教会香港区会长庞乐培神父(Fr. Bruno Lepeu)提供并翻译资料。

① 详见拙文:《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与发展》,《文化杂志》中文卷第65卷,2007年冬季刊。

② Cuenot, *Au Pays des Pavillons-Noirs La Mission du Kouangsi*, Hongkong: Imprimerie de Nazareth, 1925, p.12.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47页。

众传教, 1877年建立一座两层厢房的简易堂点。1870年6月18日, 苏西叶神父(Souchières)来到西林, 面向高山汉族和苗族群众传教, 初建刘家坨堂点(今田林县平塘乡渭各村经堂屯)。

1877年, 陈永康神父(Chantclair)由西林县前往西隆县(今隆林县)面向壮族传教。至1900年, 西隆县境建立7座天主堂(县城、旧洲街、者隘、科皓、极相、者磨和仁兴者)^①, 教徒大部分是壮族人。其中1878年, 建凌云乐里天主堂。1881年, 顾元俊神父(Creuse)开始在百色传教, 1900年兴建百色镇天主堂。1889年, 司立修神父(Chouzy)重建西林县新兴街教堂。1897年, 邓玉函神父(Mazel)进入广西凌云县城, 拓展当地壮族和彝族的传教工作, 次年与陆文思神父(Labully)一起建凌云县城厢天主堂。至1911年, 据不完全统计, 这里有教堂13所, 教友数量不少于1400人, 绝大部分是壮族、彝族, 还有不少布依族、苗族和高山汉民。^②

民国时期, 此地教务发展迅速, 最终形成以培养山地民族教友为特色的安龙教区。1922年, 巴黎外方传教会把广西百色五县(今西林、隆林、天峨、田林、凌云)与贵州黔西南州盘江沿岸十县(今安龙、兴义、盘县、兴仁、贞丰、册亨、普安、罗甸、晴隆、望谟)建成独立的安龙监牧区, “下设五个总铎区, 其中第五总铎区为广西者隘总铎区, 管辖西隆属之者隘、科皓, 西林属之常井、刘家坨四个堂口, 当时有西籍神甫7人, 本籍神甫5人, 正式堂口12个, 教友达1万多位, 绝大部分为彝族、壮族、布依族教徒。”^③1927年升格为安龙代牧区, 1946年中国实行“圣统制”, 安龙教区升为正式主教区。贾禄(Carlo)一直担任安龙教区主教, 直到1951年被驱逐。期间, 隆林者隘本堂神父为谢贵禄(Séguret); 常井本堂神父为费德礼(Thomas); 刘家坨本堂神父为欧德章(Courant), 定安本堂神父为颜尔定(Épalle)。1949年安龙教区有32位外国神父, 9名外国修女, 有中国神父20人, 此时教徒总共有11319人。共有20个堂口, 还有16个非正式堂点。^④

1949年初, “有的信徒说, 在1956-1958年仍有神甫从贵州寄瞻礼单来, 有的人还把瞻礼单贴在村边墙壁上……有的人虽不在经堂念经, 但还到外面或晚间自己念经”^⑤。改革开放之后, 宗教政策得到落实, 常井堂和刘家坨堂1986年10月10日被授予“田林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7月, 定安堂被定为“广西区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7月, 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神父谭燕全(现任广西主教)来此巡视教务, 结束了该地近40年无神父主持弥撒的状况。

2009年5月26日至6月2日, 笔者前往桂黔边界山区堂点调查, 获知田林、西林和隆林三县教务由出生于者隘的壮族神父LJ管辖, 长驻隆林县城天主堂。刘家坨堂和常井堂为2008年晋铎的壮族神父LZ管理, 定安教堂由两位修女驻堂管理。因历史传承和地理原因, 桂黔两省神职人员和教友至今交往密切。两位广西神父与贵州兴义本堂神父LZH、安龙本堂神父LYF保持着密切往来。两省民族教友, 尤其是广西壮族教友与贵州布依族教友来往亦密切。广西隆林县者保乡那立天主堂就悬挂着2005年11月13日黔西南州教会送来的该堂落成的纪念碑匾。截止调查之时, 桂西地区共有5个教堂, 22个简易传教点, 登记教友数量超过1.5万名, 少数民族占九成之多, 其中壮族最多, 依次为彝族、苗

① Wiseman, *Kwangsi land of the blank banners*, New York: Vail-Ballou Press, inc. 1942, p.28.

② 莫家仁:《近代外来天主教士在广西民族地区的罪恶活动及各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广西民族研究》, 2000年第4期。

③ 韦廷忠:《安龙教区历史资料片段》, 贵阳市档案馆, 卷号41-9-34, 第30-31页; 韦廷忠:《安龙教区的成立和沿革》, 贵阳市档案馆, 卷号41-9-34, 第106-107页。

④ 周健钟:《法国传教士在安龙教区》,《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贵阳: 省政协文史办, 1981年, 第115-150页。

⑤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院广西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组:《广西田林县天主教调查报告》, 1964年内部资料, 第25页。

族、高山汉族。^①

（二）以瑶族、壮族教徒为主的桂南十万山区

同治七年（1868年），在贵州传教的梅西满神父（Mihière）被任命为两广教区副主教，分管广西教务。次年，他派遣在广东传教多年的富于道神父（Foucard）前往广西。富于道选择了与马赖不同的进桂路线，他沿西江到梧州东进广西。他在梧州建立了简易传教点，但很快被梧州官府“封屋不准出入”，驱逐离城，富于道只得隐居在梧州郊区的九华塘两年之久，反思入桂传教路线。^②

1872年左右，富于道转道越南北部，“被迫前往与越南交界的十万山区传教，这里住着瑶族（Pan-yao），随后他就上思县城买了房屋一间作为开教点。”^③1877年，苏西叶从西林来米强协助富于道，在瑶寨西侧建立米强天主堂（今上思县南屏瑶族自治县米强村米强屯）。这些瑶族教徒利用自身迁徙频繁及婚亲等关系，把“福音”扩展到邻近米本、隆因、板旧、百管等瑶寨，使得山里不少瑶人皈依。与此同时，赖保理神父（Renault）从贵州兴义来上思，在那蒙村、公德、那圹、雷门等壮寨传教，并于1893年，兴建那蒙天主堂（今上思县在秒镇那蒙村）。^④十万山区教务的发展促使1875年，广西监牧区从两广教区独立出来，由文苟理（Jolly）担任首任主教。1878年，富于道接任第二任主教，并扩建上思县城堂点为广西主教座堂。^⑤

建国后，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当地教务由本地神父谭庚荣负责。改革开放后，宗教活动恢复。经2009年6月4日至6月8日实地调查获知，仅深处十万大山的上思县南屏瑶族自治乡，就辖有米强、东针、龙因、六龙上屯、六龙下屯、百管和百规七个教堂，各堂教友不仅交往密切，而且和越南教友亦有宗教往来。十万大山无驻堂神父，由南宁本堂神父TJT负责，日常活动由各堂会长管理，总会长为百管会长瑶族教徒LCS。登记教徒超过800人，绝大多数为瑶族教徒。^⑥其中，米强教友多自认为山子瑶，其他瑶寨教友多自认为盘瑶。《那蒙教友名册》显示九成左右教友为壮族，会长为壮族女教徒HZY，登记教徒400余人。^⑦入夜后村民陆续相约教堂跳舞闲谈，教堂已成为该村文化活动中心。

（三）以瑶族、壮族教徒为主的桂中大瑶山区

早在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等就“立志赴瑶人区域传教”，^⑧并深入广西大藤峡瑶区、大瑶山等地，散发许多宗教册子。光绪初年，晋牧不久的富于道，从十万大山转道广西贵县（今贵港），并在当地建立传教站。他与司立修先后在各县之桥圩、八塘、木格、东津、大坞塘等地建立传教点。

① 数据由LZ神父提供，并感谢LJ神父提供《隆林县各传教点分布图》，田野时间：2009年5月26日下午。

② 钟文典编：《广西通史（第二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3页。

③ CUENOT, *Au Pays des Pavillons-Noirs La Mission du Kouangsi*, pp.8-9.

④ Wiseman, *Kwangsi land of the blank banners*, p.21.

⑤ 先后到十万山区活动过的法国神父及活动时间为：富于道（1874-1889）、苏西叶（1877-1882）、赖保理（1878-1896）、苏安宁（Bertholet, 1889-1890）、周怀仁（Heraud, 1889-1893）、潘神父（Klingler, 1892-1893）、白神父（Baufreton, 1896-1899）、傅泛济（Rue, 1897-1901）、顾神父（Coste, 1899-1902）、陈嘉言（Caysac Georges, 1909-1932）等。陈嘉言长驻此地20余年，被称为“瑶族通”，他在《Bulletin M.E.P.》（《巴黎外方传教会简报》）发表了不少十万大山民族风俗类的见闻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把1928年中山大学任国荣教授进入大瑶山考察之后写的《瑶山两月观察记》，全文译成法语，分四次连载在该报1930年版之第453-465、516-526、611-613、678-689页，并用19个注释提出了与任国荣截然不同的看法。见巴黎外方传教会亚洲传教士简历档案网站：www.mepasie.org。

⑥ 天主教广西教会网站：www.catholicgx.org/ShowNews.asp?id=245&CataID=35。

⑦ 那蒙堂点史料由那蒙教会HZY会长（女，45岁，壮族）提供，田野调查时间：2009年6月6-8日。

⑧ 邢凤麟：《太平天国与瑶族》，胡起望：《瑶族研究论文集》，武汉：中南民族学院，1985年，第386-388页。

近代以来,贵县几成广西天主教传教活动的中心,县城、覃塘、黄练、八塘、三塘等乡镇遍布天主教堂,教徒多至2000余人。^①1890年,继任主教之位的司立修,把广西主教府从上思县迁往贵县。从此,传教士便以贵县为基地,逐步向桂平、武宣、象州、修仁、荔浦和永福等毗邻大瑶山各县传播“福音”。^②“永福县是天主教传播桂东北的重要据点”^③,促使1901年赖保理建堂广西省府——桂林。经过苏安宁神父、周怀仁神父、童铨神父(Crocq)、傅泛济神父、唐定球神父、玛利诺传教会的Meyer和法国的马维良神父(Peyrat Jean)等传教士的努力,截止1905年,毗邻大瑶山的各县教堂就有8个^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龙女教堂和土养槽教堂。

晚清民国时期,象州是进入大瑶山的主要通道。该县大乐乡龙女堂即位于入口处,由司立修初建于1886年,《简报通讯》对该地天主教传播初期的状况有如下记载:“……1885年3月,龙女村三位非教徒的小学教师,他们分别名叫:Ts'in Tché-n-ki, Ts'in Yün-lông, 和 Tch'ao Lân-fen, 他们三人去贵县请教理讲解员去他们家。13个家庭开始听从这三位小学教师的讲解,就这样形成了龙女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团体,这就是该县的基督信仰活动中心……”^⑤龙女天主堂初建于1886年,由首任本堂神父司立修筹建。1890年,苏安宁接任本堂,买了近3000平方米的土地,准备扩建圣母堂,四处的瑶、壮、汉人蜂拥而至,教务发展显著。1898年4月21日,以其为主角的“永安教案”爆发。他死后,傅泛济接任本堂(1898-1902),1901年他完成了苏安宁遗留项目,建成龙女圣母天主堂,后因身体不适去香港看病。1903-1915年间,唐定球(Dalle)接任本堂,他把传教区域扩展到鹿寨、柳城等县。范翰清(Tessier)在1915-1920年间,康泰(Rigal)在1933-1935年间,马维良(Peyrat)在1946-1948年间,先后继任本堂。期间,龙女教堂下辖桐木、上架、宿对、下令等民族村寨的教务,瑶族和壮族教徒占大部分。^⑥“文革”期间,教务停止。落实宗教政策后,当地教徒覃思贤管理教务。龙女堂现无驻堂神父,由柳州市堂CSL神父管理,日常由会长WJS管理。登记教徒200余人,以壮族为主,杂有瑶族。^⑦

土养槽是桂林南部一个边远小山村,该村深处鹿寨、永福与金秀三县交界山区,毗邻大瑶山,辖有土养槽口、下寨、六旦、上寨、古标等13个自然屯,面积51平方公里。天主教在土养槽山区的传播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893-1925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开端时期,先后有苏安宁、傅泛济、唐定球、卢安德(Pelamourgues)和康泰主持教务。1925-1951年,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发展时期,以季伦神父(Francis Keelan)为主。1984年至今,由本地神父管理,先后有徐乐君、HQC、TSY、LCG(首位本地瑶族神父)来此传道。2006-2007年间,笔者三次前往该地调查。2007年登记教徒人数317名,绝大多数为山子瑶教徒,日常教务由会长QQJ负责。土养槽堂区是个典型的利用瑶族教徒迁徙频繁、入赘上门等瑶族文化特质来发展教务的“山区教会”。^⑧

① CUENOT, *Au Pays des Pavillons-Noirs La Mission du Kouangsi*, pp.15-16.

② 钟文典编:《广西通史(第二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3页。

③ 钟文典编:《广西通史(第二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

④ 廖扬:《金秀大瑶山天主教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考察》,吴义雄编:《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2-93页。

⑤ [法] 秩名著,庞乐培译:《苏安宁神父在广西象州传教记实Ⅱ·传教使命(上)·司立修神父的传教使命》, *Bulletin M.E.P., Hongkong: Imprimerie de Nazareth*, 1935, p.633.

⑥ [法] 秩名著,庞乐培译:《苏安宁神父在广西象州传教记实Ⅲ·传教使命(下)·苏安宁神父的传教工作》, *Bulletin M.E.P., Hongkong: Imprimerie de Nazareth*, 1935, pp.689-697.

⑦ 数据来自龙女会长WJS(男,78岁,壮族),田野调查时间:2007年10月12日下午。

⑧ 详见拙文:《清末以来天主教在广西瑶族地区传播发展研究——以桂林土养槽山区教会为个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第15-16页及第38-60页。

三、结语：边缘与多元的“山区教会”

晚清以来天主教在上述三个广西民族山区的传播历史与现状，体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是传教士入桂传教路线经历了“西线—南线—东线”的转变，三条线大抵即以上述三个民族山区为传播起点。西线为拓荒线路，由马赖开辟，大致是从贵州兴义，经田林县常井、定安和刘家佗三个天主堂，进入桂西民族山区，由西向东传播至广西腹地，培养了一批以彝族、壮族、布依族和高山汉为主的早期教徒。西线盛于1850—1870年代，以1878年富于道建立上思主教府为界限。南线由第二任广西主教富于道开启，从越南北部山区，途经上思县米强、那蒙和县城三个教堂，穿越十万大山由南向北进入广西内陆，形成了另一批瑶族、壮族为主的教徒。南线盛于1880—1890年代，以1890年贵县主教府的迁址，尤其是1897年《西江通商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签定为界限。其间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事阻断了此线。东线由第三任广西主教司立修开启，从粤港澳出发，沿西江上游至梧州，分三路入桂（漓江北上桂林，柳江中进柳州，邕江南下南宁），以贵县主教府为基地，向中部大瑶山各毗邻县域扩散，形成了又一批瑶族、壮族和客家人教徒。清末民国年间，东线成为外国传教士进入广西的主要路线。传教路线的转变结合了广西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双重特性，体现天主教在广西的“本土化”历程。

其次，经历了传教对象“从上到下”和传教区域“由中心到边缘再返中心”的转变。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广西开路先锋”最初在桂林和梧州等中心城市传教失败后，吸取教训，改变了耶稣会士在广西中心城镇面向上层人士的传教策略，他们操着少数民族语言，穿着民族服装，深入广西边远山区向这些山地民族“天主子民”积极传教，形成了大量山地民族教友村落，直至今日。西线的桂黔边界山区到百色，南线的桂越边境十万山区到南宁，东线的大瑶山区到桂林，都说明了这些地处边缘的山区堂点，奠定了传教士重返中心区域传教的基础。

最后，这些民族山区教友村落逐渐演变成为深处边缘区域而文化多元的“山区教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当地族群交往与社会文化变迁，是深化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山区教会”多指活动中心处于边远少数民族山区的传教堂区，堂区成员多为山地民族教徒，兼具族群与教徒双重身份，无神职人员驻堂，日常宗教活动多由当地教友自行组织参与，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交融共存，主要分布在西部民族山区。“乡村教会”多指活动中心在基层乡村社会的传教堂区，成员主要来自乡村社会中的普通汉族阶层，多分布在华中内陆丘陵地区。“城市教会”指以都市为中心的传教堂区，教徒多为城市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比较高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大商人，多分布在华东沿海城市。从历史到现在，中国这三个类型的教会都广泛存在，但对他们尤其是山区教会的研究，由于语言限制、资料不足等原因却显不足。从内部看，“山区教会”独具当地族群文化特质的传教模式（如瑶族迁徙频繁、入赘婚俗与天主教的传播）、宗教活动（如民族音乐、乐器、舞蹈与弥撒仪式）和神学观念（民族传统神话与圣经神学表达）等，展现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另一生动画面。从外部看，“山区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团体，必然与当地社会组织发生关系，影响到当地族群交往和社会文化变迁。

（责任编辑 杨华明）